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



WENREN YU CHA

文人与茶

■ 胡长春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

WENREN YU CHA

文人与茶

■ 胡长春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人与茶 / 胡长春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7-5161-5561-5

I. ①文… II. ①胡… III. ①茶叶—文化—中国 IV. ①TS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258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叶建政

责任印制 张雪妍

出 版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75

插 页 2

字 数 322 千字

定 价 6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编委会

主 任 汪玉奇

委 员 姜 玮 毛智勇 万建强

叶 青 马雪松 夏汉宁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总序

汪玉奇

繁荣和发展社会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说，科学技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而科学技术中包括社会科学，那么繁荣和发展社会科学就是提升和壮大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站在这样的高度审视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审视我们所获得的学术成果，我们充满民族的责任感和时代的使命感。

江西自古以来文风鼎盛，在这片土地上，产生了一大批光耀中华史册的文化名人。辉煌的历史必然给历史的传承者提出一个责无旁贷的问题：学术薪火能否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熊熊燃烧下去？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作为全省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心和最高机构，必须坚定而响亮地回答这一问题。

——我们要与时俱进，追踪和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奉献更多的创新性成果。

——我们要紧贴江西科学发展、进位赶超、绿色崛起的发展大局，探寻欠发达地区加速推进现代化的规律与路径，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服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智库。

——我们要精心整理和研究江西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使其中的精华得以传承、弘扬和光大。

于是，我们勤奋，我们敬业，我们耕耘，我们收获。中华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字铸造的文明，古往今来，中国的学者们都注重著书立说。在“十二五”开局之年，我们隆重地搭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以此报效故园、报效国家、报效时代。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中国历代文人的品茶生活	(14)
一 姜桂茶笋出巴蜀	(14)
二 纱帽笼头自煎吃	(27)
三 林下雄豪先斗美	(42)
四 松根自汲山泉煮	(65)
第二章 文人与品茗风习的嬗变	(98)
一 汉魏六朝话缘起	(98)
二 唐代陆羽“茶经法”	(106)
三 宋元“点茶”与“斗茶”	(117)
四 明清散茶瀹饮法	(135)
第三章 文人与茶文化理论的发展	(148)
一 气魄宏大的肇端	(148)
二 龙凤盛世的辉煌	(158)
三 别开生面的发展	(167)
四 封建末世的遗响	(180)
第四章 古代茶文学艺术作品概貌	(189)
一 琳琅满目话茶诗	(189)
二 隽思妙寓茶散文	(218)
三 明清小说发茶香	(233)
四 茶画茶联及其他	(245)
第五章 历代文人与茶道文化	(257)
一 修身审美惟饮茶	(257)
二 孰知茶道全尔真	(266)

三 茶道文化薪火传	(289)
主要参考书目	(304)
后记	(306)

绪 论

茶是甘芳高洁之物，饮茶是清新高雅之事，文人与茶，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缘分。作为一个文人，如果不懂得饮茶，那可能是人生一大憾事。在中国茶文化久远漫长的发展史上，最先培养起对茶这种饮料的独特感觉，最先体会茶之神韵的无疑是历代的文人；同时，文人在品茗过程中不断雅化茶事，使饮茶这种普通的生活方式上升到文化的高度，从而实现了精神与物质的高度统一；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文人不断丰富茶文化的内涵，引领茶文化的潮流，规范茶文化的发展方向。历代文人对茶文化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从这一点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没有文人的参与，便没有茶文化。

历代文人饮茶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文化现象，彰显了中国茶文化中“雅”的一面，它是中国古代雅文化即士人文化的一部分。而大众茶文化，则集中反映了中国茶文化中“俗”的一面，是古代俗文化即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下面，笔者拟从雅文化与俗文化之间的关系谈起。

—

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各阶层、各区域共同创造的，由于各民族、各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直接导致了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这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化的创造主体、流行范围和其中所贯注的精神之不同，中华五千年来社会各阶层的文化也有不同内容和特性，从而有雅俗之分，有高下之别。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曾经指出：“在中国，在文学艺术，包括音乐、绘画、书法、舞蹈、歌唱等方面，甚至在衣、食、住、行，园林布置，居室装修，言谈举止，应对进

退等方面，都有所谓雅俗之分。”^① 有研究者则试图给雅文化与俗文化作出一个具体的界定，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雅文化又称精英文化，也有人称之为贵族文化。这是由上层社会精英所创造的、居于统治地位的文化。”“俗文化又称平民文化。它是下层平民所创造的、与雅文化相对、甚至相悖并潜流在社会生活中的文化。”^②

笔者以为，中国古代的雅文化固然是一种精英文化、主流文化，但把它称之为贵族文化似乎并不恰当。因为，雅文化的主体并不是单纯的贵族，而是中国古代的“士”，因此，把它称为士人文化则比较合适。中国古代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或“文人雅士”。应该说，古代的“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群体，其中，既包括已谋取功名、捞得一官半职的富贵之士，又包括那些笃实好学但又一贫如洗的落魄之士；既包括位极人臣的朝中显要之士，又包括那些仅仅在地方上起作用的乡绅士族；既包括满怀修齐治平思想，一心要建功立业的有为之士，又包括那些归隐山林、不问世俗的隐逸之士。钱穆先生认为：中国的士，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精神之所在，士的传统亦即中国文化传统之所在，士是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钱先生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观，对于我们理解士人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无疑是有帮助的。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文化史，几乎全是士人文化或雅文化的历史。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以语言文字为主要载体的雅文化，不断地被载入文献史籍，显露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浩如烟海的各种典籍文献，既是这种主流文化的活生生载体，又是这种雅文化最明显的表征。同时，士人文化又以其特定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积淀在人们的思维习惯、精神追求之中，形成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民族心理和群体意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然而，必须指出的是，雅文化与俗文化只是中国传统文化大系统中两个不同的层面，二者虽有区别，但它们之间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很难把二者截然分开。季羨林先生的另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什么叫‘雅’？什么叫‘俗’？大家一听就明白，但可惜的是，一问就糊涂。用简明扼要的语句，来说明二者间的差别，还真不

① 季羨林：《〈雅俗文化书系〉序》，见冈夫《茶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② 龙建国：《中国古代雅文化与俗文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容易。我想借用当今国际上流行的模糊学的概念说,雅俗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模糊的,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决非楚河汉界,畛域分明。”^①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发展史上,雅文化与俗文化既并行发展,又彼此渗透、影响、融合乃至互相转化,共同组合成中华文化的有机整体。

中国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按照茶文化专家陈文华教授的说法,茶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茶文化是指整个茶叶发展历程中所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茶文化则是专指‘精神财富’部分”。他还进一步指出,当代茶文化工作者的研究对象应该是狭义的茶文化,即“人们在种植、加工、饮用茶叶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②。这一带有指导意义的界定,深刻揭示了茶文化的本质。但笔者认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中国茶文化本身还具有内容上的丰富性和结构上的层次性,根据茶文化不同的内容特性,可以大致地把它划分为雅与俗这两个不同的层面,这就是说,茶文化也有雅文化与俗文化之分。

因此,若是把文人品茶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称作文人茶文化,恐怕也不无道理。由文人墨客、官宦士族们所倡导,主要是在“士”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流行的茶文化现象,可以称之为文人茶文化或茶之雅文化。文人茶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它贯注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显示了中国文人所特有的人生哲学和审美理想,更多地表现出饮茶的精神内容,集中反映了茶文化中“雅”的一面,从文化学的观点来看,更多的属于心态文化层次。与此相反,大众茶文化或茶之俗文化,主要是在平民百姓中流行,大都通过一定的行为模式和风俗礼仪来表现,较少表现出茶文化的精神内容,更多地显出茶文化中“俗”的一面,大体上属于行为文化层次。

当然,所谓的茶之雅文化与茶之俗文化,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定义,笔者之所以作这样的区分,主要是为了更有利于分析研究与文人有关的茶文化事象,并为自己的研究寻找一个较为合适的切入点。对于这一点,想必广大读者是能够见谅的。

① 季羨林:《〈雅俗文化书系〉序》。

② 陈文华:《长江流域茶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二

茶作为饮料，有可靠文献记载的是始自秦汉时期。当然，茶的最初发现与利用比这要早得多，相传远古时期，“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神农本草经》）；春秋时期，“婴相齐景公时，炙三戈、五卵、茗菜而已”（《晏子春秋》）。但在当时，茶尚未真正成为一种日常饮品。自从饮茶习俗在秦汉间出现以来，茶这种清新淡雅的饮料，便与文人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是哪一个朝代，茶对于大多数文人雅士都有着非同一般的诱惑力，吸引着社会上的文人墨客、高人闻士、山林隐逸投身于饮茶活动中来，他们热衷茶事、精研茶艺、究心茶道，含英咀华，孜孜以求，从而产生了一桩桩传颂不衰的品茗佳话，演绎出无数深沉隽永的文人茶情。

早在汉代，人们开始把茶作为一种饮料，史籍中开始有了不少文人饮茶的记载，如扬雄、司马相如、王褒等文人，便可算是当时饮茶的先行者。西汉蜀人文学家司马相如在其一本杂字书《凡将篇》中，记载了二十多味中草药，其中一味叫“荈诧”，指的就是茶。扬雄在著名的《蜀都赋》中，留下了这样的词句：“百华投春，隆隐芬芳。蔓茗茝翠，藻蕊青黄。”他还在一本名为《方言》的书中，介绍了茶在各地的不同称谓和发音，多多少少地显露出他对茶的喜爱和熟悉程度。另一位文学家王褒，在其所作的《僮约》中有“烹茶尽具”、“武阳买茶”之语。另据有关史籍记载，汉帝曾到江苏宜兴的茗岭“课童艺茶”，也就是招收学童，进行种茶技术培训；名士葛玄，曾在浙江天台山设“植茶之圃”，辟园种茶。这些史料，向人们透露出了多重文化信息：汉代的茶叶种植区域正处在不断扩大之中，种茶之地从传统的巴蜀一带开始向国家的东南地区延伸；由于消费和贸易的需要，茶叶已成为一种商品，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茶叶交易市场；尤其重要的是，文人开始关注和饮用茶叶，饮茶已成为一种高雅的时尚，换言之，当时的文人已成为推广饮茶风习的一股重要力量。

三国时，崇茶之风有所发展。在《吴志·韦曜传》中，记载有吴主孙皓以茶代酒饷客的故事，表明当时东吴的宫廷中可能存在着以茶代酒的风习。到了两晋、南北朝，饮茶相效成风，茶开始以一种普通饮料的姿态

走入千家万户。随着魏晋玄学的兴起，当时的上层统治者和文人士大夫之流，终日清谈，品茗赋诗，逃避现实，茶遂成为不可或缺之物。客来敬茶，以茶会友，则成为一种普通的社交礼仪，并为一些文人雅士用来象征养廉、雅志、修身的美德。史载，陆纳为吴兴太守时，谢安常来陆家拜访，陆纳对这位赫赫有名的大将军的到来，并不大肆铺张，“所设唯茶果而已”（《晋中兴书》）。东晋权臣桓温为了显示自己的俭朴，“每燕饮，惟下七奠，拌茶果而已”（《晋书》）。另据刘义庆《世说新语》称：“晋司徒长史王濛好饮茶，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① 这位大名士王濛，的确确是一位茶之“瘾君子”。与此同时，文人雅士们还开始把茶事纳入文学作品之中。张载《登成都白菟楼》、左思《娇女诗》、孙楚《出歌》、王微《杂诗》等诗章之中都有关于饮茶的美妙诗句，杜育《荈赋》则是现存最早的以茶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显然，这一时期饮茶风气的推广和茶文化萌芽的出现，往往得益于崇尚清谈的文人。

唐代是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高峰。茶圣陆羽所撰述的世界第一部茶书，享誉全球的《茶经》得以杀青问世，构筑了一个气度恢宏、体系完备的茶文化体系。陆羽以其精湛的茶艺，科学的概括，丰富的理论思维，极大地推动了茶饮风习的普及和饮茶艺术化过程，使唐代成为茶文化发展史上的首个黄金时代。然而，唐代“茶道大行”，除茶圣陆羽其功不朽外，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推波助澜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作为最有文化、最有艺术品位的群体，文人士大夫阶层把饮茶视为一种能够显示高雅素养、寄托感情、表现自我的艺术活动，不断地雅化茶事，从而形成了以“品”为中心的饮茶艺术。士人相聚，必煮水煎茶，品茗清谈；迎宾待客，则举行茶宴、茶会、茶集，吟诗联句，其乐无穷；朋友之间，还时常不远千里，寄赠佳茗，共同品尝大好茶味。许多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嗜茶成癖，乐此不疲。在上层人士中，宰相李德裕、吏部尚书颜真卿、兵部员外郎李约、湖州刺史李季卿等，皆是酷爱饮茶之人。在唐朝诗人当中，醉心于茶事，有茶诗传世者，约有百余人。其中如李白、白居易、皮日休、陆龟蒙、杜牧、刘禹锡、柳宗元、温庭筠等大诗人，皆有饮茶之佳作传

^① 据《太平御览》卷867引（不见于今本《世说新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世。尤其是诗人卢仝一曲脍炙人口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俗称《饮茶歌》），用夸张的手法，把饮茶的感觉描绘得淋漓尽致，堪称千古绝唱，对饮茶风习的普及推广，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巨大的推动作用。

宋代是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期。“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入宋以后，饮茶之风更炽，茶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茶事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这正如北宋时李觏所言：“茶非古也，源于江左，流于天下，浸淫于近世，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①虽然宋代的饮茶之风进一步吹向社会各阶层，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宫廷茶文化、大众茶文化较唐代均有很大发展，但是，在茶叶种植、加工、品饮方面精益求精，对饮茶倾注最大的热情，把饮茶当作一种高雅的生活艺术，引领茶文化潮流，规范茶文化发展方向的群体，依然是文人士大夫阶层，这就是说，宋代文人对品饮艺术的追求，较唐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是时，饮茶的风习与唐代稍有不同，唐代文人品茶，有一套固定的程式，侧重于烤、碾、煮、分、酌等方面的技艺，而宋人则既注重饮茶过程本身，又注重品茶过程中的情趣和韵味，追求品茶过程中的自我表现。因为，茶所体现出的那种宁静淡泊、深邃雅致特性，与宋代文人追求的悠远意境和内省雅致的时代心理极为相契，是故，文人士大夫们在品茗涤烦疗渴的同时，又着力营造一种优美、雅致、和谐的品茗氛围，在这种艺术氛围中陶冶心性、观照自我、表现高尚人格，不断地推进饮茶艺术化的进程。流行于有宋一代的“斗茶”，就是宋人把艺术品饮风习推崇到极致的必然结果。

宋徽宗《大观茶论》言：“天下之士，励志清白，竞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筐篚之精，争鉴裁之妙。”对宋代文人热衷茗事、竞相斗茶作了全面细致的描述。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中，制新茶、饮佳茗、吟茶诗、作茶赋、著茶书，成为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北宋大臣丁谓、蔡襄先后任福建转运使，别出心裁，精心造茶入贡，分别创制出了大小龙凤团茶。大文豪苏轼，精于品茶、煮茶、种茶，对茶史、茶典故、茶之功用都颇有研究，创作出不少脍炙人口的茶叶诗词。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一生爱茶，至老不移。他曾参与茶法改革，起草《通商茶法诏》，又撰专门论述煮茶用水的《大明水记》、《浮槎山水记》，

^① 李觏：《盱江集》卷1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还写下了大量关于饮茶的诗歌。大诗人黄庭坚也是爱茶之人，曾把家乡宁州出产的双井茶分赠京师好友。南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曾与其夫赵明诚饮茶作押，猜典故以较胜负，素来被传为美谈。其他如王禹偁、林逋、王安石、梅尧臣、范仲淹、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人，也留下了不少咏茶的诗词歌赋。宋代所涌现的如此众多的茶文学作品，其中所蕴含着的文人茶情，尽在不言中。

明清时期，是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代，茶文化的发展渐趋鼎盛。有明一代，茶业和茶政空前繁荣，产区进一步扩大，制茶技术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其主要表现是散茶勃兴，团饼茶退出历史舞台。从明初起，随着炒青制法的确立和不断完善，散茶逐渐占据了统摄茶坛的地位，茶之采造更加契合自然之美，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茶叶的自然本色。随之而来的是品茗风尚也为之一变，面貌一新，简便易行的散茶瀹饮法取代了唐宋时期烦琐的煎茶法与点茶法，人们在品尝到茶之自然、纯朴、甘芳之风味的同时，能够自然而然地进入艺术品饮的氛围，从而实现饮茶怡情悦性、雅志修身的功能。明清时期简约茶风的形成，品茶艺术的演进变化，茶道精神的发扬光大，同样离不开文人雅士丰富的茶事实践和他们所创立的茶文化理论的先导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人饮茶的心态更趋平和、理性，但茶饮在明清文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依旧，文人士大夫的嗜茶情结依然如故，对于大多数文人而言，茶饮的巨大诱惑力是无法抗拒的。有明一代，是中国文人撰述茶书数量最多的一个朝代。从现今存世的 30 多部明代茶书的作者来看，其中既有高人闻士、王室贵胄，也有落魄书生、失意文人。虽然他们的身份与经历各异，然而，他们无一不是对茶倾注了毕生心血、与茶相伴终生的著名的茶人，朱权、田艺蘅、陆树声、顾元庆、屠隆、张源、陈继儒、许次纾、徐爌、熊明遇、喻政等人，便是其中之杰出代表。明人的诗歌作品，尽管大都不能和唐宋时期的名家大作并列，可是高启、吴宽、王世贞、文徵明、邵宝、徐渭、袁宏道、袁中道、于若瀛、汤显祖等人，均有不少咏茶赞茶的佳句名篇。入清以后，明代简约、雅致、内敛的茶风，仍然在文人雅士之间流传，一直延续到清末。张岱、杜浚、陈确、冒襄、余怀、陆廷灿、袁枚、郑板桥、震均等人嗜茶，在清代是出了名的，而吴伟业、方文、周亮工、朱彝尊、施闰章、王夫之、孙枝蔚、汪懋麟、纳兰性

德、曹寅、厉鹗、金农、丘逢甲、连横等诗人，都有相当数量的茶叶诗词传世。这就明白昭示着茶对于文人生活的极端重要性，充分表现了茶与文人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

三

从上文中的初步分析来看，汉代以前，由于饮茶之风习未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文人饮茶并不常见，魏晋南北朝以后，文人对茶的关注程度不断加深。自唐代起，文人开始历史地担当起饮茶的主角，著名的文人雅士、达官贵人几乎没有不嗜茶的。无论是唐人饮茶之粗疏质朴、法相初具，还是宋人饮茶之夸豪斗富、穷极工巧，或是明清饮茶之清雅脱俗、面貌一新，历代文士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各个朝代的茶叶品类、茶具、烹饮方法各不相同，历朝文人品饮心态也有某些细微的差别，但文人饮茶的高明之处、高雅之举，在于使物质生活方式与人们的精神生活相一致，在于使世俗生活和闲散情致相吻合，在于品茶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哲理意味和精神追求。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文人饮茶的风习初步发端之际，饮茶便成为士人显示俭朴、廉洁的手段和高尚人格的象征。进入大唐盛世，茶圣陆羽所倡导的艺术品饮风习风靡一时，在文人士大夫中大行其道，从而使日常的饮茶活动实现了从物质享受到精神愉悦的飞跃。陆氏在《茶经·一之源》中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言下之意似乎是说，只有“精行俭德”之人才适合饮茶。这“精行俭德”四字，规定了茶人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行，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第一次把茶与人们的道德品质相联系，体现了陆羽所倡导的茶道精神。大约与陆羽同时代的裴汶在《茶述》一文中言：“茶……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烹之鼎水，和以虎形，人人服之，永永不厌。”其中，“其性精清”、“其味浩洁”，说的是茶本身高洁的品性；“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则把茶能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功能作了高度概括，充分显示出当时文人饮茶重在精神的一面。

唐人诗歌中，对饮茶描绘最生动、最贴切、最富感染力的诗作，要算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其诗言：“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其中除了“一碗喉吻润”属于生理感受外，其余皆贯注了特定的精神内容，表明诗人每饮一碗，都会有不同的感觉，精神意韵层层递进，从而彰显了作者在饮茶过程中的多层次心理体验。诗僧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中，有“一饮涤昏寐”、“再饮清我神”、“三饮便得道”的描写，与卢仝《茶歌》有异曲同工之妙。晚唐的刘贞亮，则提出了著名的“茶十德”：“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在作者看来，茶除了可以养生、除病、驱睡、尝味等生理功效外，还有修身、雅志、行道等精神功效，以及茶礼、茶仪等方面的社会功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唐人对茶之功能的认识。

在“郁郁乎文哉”的宋代，相对开放、外倾的唐代文化，向相对封闭、内向的宋代文化转型，从而形成了精巧细致、清雅脱俗、注重内省的文化特色。宋人饮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唐人品茶中一整套繁复的煮饮程式，但在选茗、择器、选水、碾罗、烹茶、品饮等方面，则更趋精巧、雅致、奢华；宋人在品茶过程中所显示出的精神追求，所贯注的人生哲学、审美理想，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宋徽宗《大观茶论》有言：“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在这里，宋徽宗以一个当朝皇帝的口吻，把饮茶规范为“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的“盛世之清尚”，即一种只宜在高人雅士中推广的高雅艺术活动。其中所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冲淡闲洁，韵高致静”，既是对饮茶之精神功效的精当概括，又是对文人品茶所追求的崇高艺术境界的生动描绘，一向为历代茶人津津乐道。

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一诗，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宋代广泛流行的“斗茶”之情景，属宋代茶诗中千古传诵的名篇。其中如“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不如仙山一啜好，冷然便欲乘风飞”等句，用夸张的手法，描写斗茶一决胜负时的心灵感受，表面上描写的是宋人斗茶，其实显示了一种高洁的时代精神，代表着一种清雅的生活方式，反映了一种对艺术的无止境的追求。大诗人

苏轼，曾以拟人化的手法撰《叶嘉传》，赋予茶叶以种种美德，实际上是借物喻人，以表现作者高尚的节操和志趣，表现文人饮茶的精神追求。南宋诗人杨万里诗云：“故人气味茶样清，故人风骨茶样明。”（《木盦之舍人分送讲筵赐茶》）他由饮茶想到远方的友人，想到友人恬淡的气质和清雅风骨，茶情、友情融为一体，为文人饮茶增添了新的内涵。

在散茶大行其道的明清两代，文人饮茶，大都讲究茶要佳，水要甘，环境要美，心态要静，客人要雅。明代文人在日常的饮茶活动中，较唐宋时期更加注重茶人的心性修养，从而对品茶对象的选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陆树声、屠隆二人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如陆树声认为适宜品茶的人群是：“翰卿墨客，缙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轩冕之徒，超轶世味者。”言下之意，无非是说只有文人、僧道、处士、官僚等四类人物中的超凡脱俗者，才有资格品茶。陆氏还提出了饮茶时必须做到“人品与茶品相统一”的观点：“煎茶非漫浪，要须人品与茶品相得，故其法每传于高流隐逸，有云霞泉石磊块胸次间者。”（《茶寮记》）屠隆则直截了当地指出：“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修德之人。”（《茶说》）其中之涵义，与陆树声所强调的只有四个类型的“茶侣”才宜品茶的看法大体相同。其目的都是为了强调茶侣的知识、人品、修养，要求饮茶者的人品与茶品相吻合。

在促进品茶生活艺术化的过程中，明代文人还十分注重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因而对品茗环境的要求相当严格。如朱权认为，适宜饮茶的环境主要有泉石之间、松竹之下、皓月清风、明窗静牖，只有在自然、洁净、宁谧的环境中，才能享受到品茶之乐。陆树声提出，理想的品茶环境是：“凉台静室，明窗曲几，松风竹月，晏坐行吟，清谭把卷。”（《茶寮记》）他对品茶环境的要求与朱权基本一致。明代不少文人还从品茶的环境、场合、饮时等方面出发，反复申明了“茶宜”与“茶忌”。这些论述，无非是为了营造一个洁净、优雅、闲适、自然、静谧的品茶环境，以便在此种宜茶环境下，通过情趣盎然的艺术品饮活动，使灵魂得到净化，思想得到升华，精神获得极大的满足。

入清以后，饱受国破家亡之痛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继承了明末以来清饮雅赏、崇尚意境的茶文化传统，于是，清香爽适但难免带有几分苦涩的茶茗，时常被人们用来排遣故国之思，表现清白高洁、孤芳自赏的情怀。清中期以后，随着传统意义上六大茶类的最终定型，人们的饮茶方式也日